

学人丰采



风笑天, 1954年生, 社会学博士,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评审组成员, 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 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研究方法, 青年社会学, 家庭社会学, 人口社会学, 独生子女问题等。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重点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等课题。著有《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独生子女: 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的印记》《社会研究: 设计与写作》《社会研究: 科学与艺术》等著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第一作者署名论文 130 多篇。

聂锦芳, 1966年生, 哲学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等荣誉。主要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学和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批判与建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等代表著作; 主编《“巴黎手稿”再研究: 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 文献、思想及其当代性》等编著, 发表学术论文 190 余篇。



苏亦工, 1962年, 法学博士,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和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著作主要有《天下归仁: 儒家文化与法》(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初版, 2007年再版)、《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并有译著《法律现代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古籍整理《历代判例判牍》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



专家匿名审稿制期刊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举报电话 010-63094651)



社会科学辑刊

2017 / 3

双月刊 总第 230 期

SOCIAL SCIENCE JOURNAL

ISSN 1001-6198

主管主办 辽宁社会科学院
总编辑 刘瑞弘
副总编辑 薛勤
编辑出版 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创刊时间 1979年3月
出版日期 2017年5月15日
执行编辑 车流畅

电子邮箱 哲 学 jikan01@163.com
法 学 jikan02@163.com
社 会 学 jikan03@163.com
经 济 学 jikan04@163.com
历 史 学 jikan05@163.com
文 学 jikan06@163.com
综合学科 jikan07@163.com
总 编 辑 jikanshx@163.com
副 总 编 辑 jikan09@163.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笔谈】

主持人语 / 邱海平 / 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邱海平 / 6

关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要原则 / 何自力 /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致力于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 谢地 / 13

探索智能经济发展新规律 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 纪玉山 / 16

积极探索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多种实现形式 / 蒋永穆 / 1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缓流”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澳)罗兰·博尔 臧峰宇 / 22

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及对其一生的影响 / 聂锦芳 / 32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坚守”与“逃离” / 鲁绍臣 / 40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吸纳范畴谈起

【社会学方法研究】

定性研究概念与类型的探讨 / 凤笑天 / 45

个案研究结论的一般化:悦纳困境与检验推广 / 董海军 / 53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法律对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法治方略 / 熊琼 / 60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

东北绿色发展背景下行政指导功能研究 / 李劲 / 67

税收的价值选择:以道德价值为基础 / 王世涛 靳业威 / 73

【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

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的内在逻辑 / 张丰伟 赵文 / 79

——收入分配问题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居民特性与家庭财富持有意愿研究 / 林芳 / 91

——来自西部地区699户家庭的回答

【法制史研究】

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修频时间、传本及特色 / 苏亦工 / 102

清代河工贪冒考论 / 刘志松 / 107

【边疆史研究】

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 / 魏志江 / 114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 / 赵永春 / 122

【近代史研究】

沈翔云回国参加过自立军起义考辨 / 曾业英 / 134

耶稣会会士之著译:孔子进入美国的最初媒介 / 张涛 / 142

【百年文学学术史案研究·鲁迅专题研究】

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吕周聚 (日)藤井省三 / 149

——藤井省三教授访谈

鲁迅与佐藤春夫 / (日)藤井省三 / 155

——两位作家间的互译与交往

周氏兄弟与大逆事件 / (日)小川利康 / 159



【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

作为方法的报刊 / 鲍国华 / 167

——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小说转型研究的可能性

“心存邦国”和“诗人之诗” / 胡全章 / 173

——清末《时报》诗歌和“平等阁诗话”

张赤山与《海国妙喻》辑录之研究 / [韩]吴淳邦 / 182

【西方文艺理论热点问题研究】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的中国之旅 / 周启超 / 190

——以“陌生化学说”为中心

朗西埃对利奥塔崇高美学及法国理论“伦理转向”的批判 / 王嘉军 / 200

——兼以列维纳斯哲学对其回应

【前沿会讯】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回顾与前沿问题展望”研讨会综述 / 冯 静 / 207

Sponsor: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ited & Publish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ddress:

No.86 Taishan Road, Huanggu District, Shenyang, Liaoning, P.R.China

Tel:(024) 86120485 Postcode:110031

Foreign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 (P.O.Box 2820, Beijing, P.R. China)

Magazine Number:

ISSN 1001—6198(International)

CN 21—1012/C (Domestic)

Domestic code:8—105

Overseas code:BM 338

Publication Date:May. 15,2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笔谈】

【主持人：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热潮，并且已经出版了有关的专著、教材和论文集，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在于，这一范畴的提出，指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即构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有力地指导新时期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理念，如何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以及党的理论和理念，进一步总结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是我国经济学理论界面临的重大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过程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并逐步得到解决，其中包括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逻辑起点问题、主要范畴和基本理论及其逻辑关系问题、体系的完整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等等。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是未来一定时期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为了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本刊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栏，持续刊发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学术研究成果，欢迎学术界专家踊跃参与讨论。

本期刊发的是几位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所展开的一组笔谈。其中，邱海平教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进而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价值。何自力教授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四个方面的重大原则。谢地教授针对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薄弱环节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论证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并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基本特点。纪玉山考察了智能经济的兴起及其特征，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蒋永穆教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探讨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多种实现形式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暖流”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澳】罗兰·博尔 臧峰宇
臧峰宇译 李萍译校

【摘要】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产生于异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宗教既表达了对一个更好世界的向往，但它又是一个不正确世界的产物。也就是说，宗教是非常矛盾的。它可能是非常保守的，反对科学和哲学中的新发现，反对新的政治方向并主张维持现状，同时，它也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挑战同样的权力。而马克思正是使用从宗教研究中产生的概念——拜物教来表述资本内部非常神秘的运作过程的。马克思理论始终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辩证法，客观和主观的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理论的“寒流”和“暖流”。“寒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维度，而“暖流”则指的是马克思理论中激情和情感的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心脏”，是马克思理论中最鼓舞人心的部分。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理论里最不应该忽视甚至抛弃的就是马克思的激情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关键词】“暖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认同；世界历史意义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暨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3XNJ048）

【作者简介】罗兰·博尔，哲学博士，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纽卡斯尔 NE1 7RU），中国人民大学新奥讲席教授（北京 100872）；臧峰宇，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译者简介】臧峰宇，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译校简介】李萍，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3-0023-10

臧峰宇：博尔教授，您好，很高兴与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我看到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网站上关于您的简介，开篇这段话就很引人注目：“罗兰·博尔不是您所了解的那种平常的学者，他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神学家。他喜欢的学术研究是在诸如‘作为天然主义者的列宁’这样的标题下激起论辩，如果能激发人们

关于宗教的思考和讨论，他就认为质疑和评价是一件好事。”确实如此，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的角度新颖、视域开阔，文字也很有感染力。在阅读您的论著的时候，我时常思考一个与人生有关的学术问题：是什么使您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罗兰·博尔：峰宇，您好！这个研究兴趣可以

追溯到30年前。我的第一个学位是西方古典学，侧重于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正是在语言学领域的兴趣使我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悉尼大学被称为“神学”的学问。为了在原初语言中研究《圣经》，我在那里钻研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且也需要研究叙利亚和科普特的古代语言，因为《圣经》的早期版本都是用这些语言写作的。由于从事这项研究，我开始关注政治神学和解放神学。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不平等，进而试图将这些方法与基督教神学联系起来。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是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欧洲，宗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紧密联系。

接着，我决定研究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不是阅读别人写的关于他的著作。这个决定使我在硕士论文中关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主要是一项哲学研究，其中具有宗教维度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旨趣。1988—1993年，我在麦吉尔大学写的博士论文体现了双重兴趣。为了解读某些《圣经》文本，我的论文借鉴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我发现回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确实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圣经》的传统。从那时起，我已经详细研究了传统，并出版了一些著作。也许最著名的是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圣经批判》。10年后，基于进一步的研究，我彻底重写了这本书。2014年的修订版是《马克思主义对希伯来圣经的批判》。在相关领域，我在2015年出版了另一项研究成果，就是《古代以色列的神圣经济学》。这项研究运用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激励调节理论，提出对古代西南亚经济学的彻底重建，古代以色列是其中的一个小王国。这是一项深入的马克思主义重建，我希望提供一种其他人可以使用的模型。至今关于这项研究的回应都是非常积极的。

臧峰宇：这项关于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很有趣。我记得恩格斯曾经深入研究过教会的经济生产，他详细分析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您的写作一方面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特质。除了您刚才提到的

詹姆逊，我认为恩斯特·布洛赫、阿兰·巴迪欧对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宗教思想的分析也表明，在一个独特的研究框架和某种文化的或宗教的语境中，您融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洲哲学传统的影响。

罗兰·博尔：是的，我的梦想一直是详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我感到它与宗教有着广泛的联系。我发现了很多引导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宗教的著作，这并不令人失望。这个层面应当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受到欧洲哲学数千年从事宗教思想研究这一传统的影响。这项研究开始于10多年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发展。研究成果是从2007年到2014年陆续出版的五卷本著作《天国的批判与尘世的批判》。这本著作主要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有关宗教的著作，它也提供了一系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卡尔·考茨基到阿兰·巴迪欧。随后的一本书是对列宁的研究。很多人可能认为，关于宗教，列宁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我发现他在著作中对宗教的研究可能远远超过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我对待这些资料的方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宗教思想的长期专业研究的方式。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已经从中发展了一些关键概念。其中之一就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暖流”。

一、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暖流”

臧峰宇：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发表的演讲“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股‘暖流’”引人入胜，这种颇富活力的研究旨在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停滞，使之成为吸引人们心灵的“暖流”，实则是对作为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阐释。毋庸置疑，信仰马克思主义使很多人走上为人类而工作的道路，并从中感到温暖和幸福。尽管为此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但因为希望的召唤，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感到自身使命的光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依靠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激情，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作者强调的主要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理论公式以及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



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种希望的色泽。您认为应当如何理解作为文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股“暖流”能否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罗兰·博尔:我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辩证法。这些通常在经济、政治、社会动力学和阶级冲突等历史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干预的范畴中得到理解。例如,一场革命就是这些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的结合。客观条件可能使革命的时机成熟,但若没有革命的共产党在此过程中的主观干预,革命不可能自己发生。共产党在这样行动的时候实际上改变了客观条件。然而,客观和主观也可以被理解为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寒流”和“暖流”。“寒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性、经济矛盾、阶级冲突等资本主义动力学的研究就是这种科学方法的一部分。人们观察客观情况并试图形成解释这些观察的理论。马克思发现对资本主义既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所以他提出了新的解释,至今产生着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他们后来的研究中延续了这一传统。

所有这些都只是一个维度。正如您提到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暖流”,即激情和情感的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心脏”,正是它激励人们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过去这种情感上的认同使人们参加革命,热衷于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有些人谈论马克思主义转向,而有些人则谈论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们可能确实要谈论文化信仰,它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部分。在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可能要与儒家的影响相比较。儒家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成为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暖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它是理解人类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部分。凭借我们的头脑,我们试图按照理性思考和行动,在行动前仔细对客观情况进行权衡。但是,我们也是感性的生命,体验着爱与恨、快乐与悲伤、得意与沮丧、热情与冷漠、激情与漠视。在西方传统中,理性思维被看作是卓越的,而情感被看作是低劣的,需要由理性来控制。这种对“寒流”的西方式强调也影响了马克

思主义,结果是使激情和情感的“暖流”被边缘化。当然,现实更为复杂,因为我们的情感影响我们的理性,反之亦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辩证的形式中,这两个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臧峰宇:是的,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问,这也关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提升当今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正如您所说,这种主观能动的愿望关乎人们的文化认同。我记得您对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思想作过深入的研究,这位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的哲学思想在今天仍富有启发性。身处关键的历史时期,卢那察尔斯基深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远价值,也深入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他关于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科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多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讨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富含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揭示了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方式将二者纳入同一历史进程。当然,为此还需要作很多精细的研究,例如,我很感兴趣的是,如何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暖流”的过程中为“寒流”保持恰当的位置?

罗兰·博尔:我认为重要的是研究“寒流”和“暖流”的关系,因而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当“寒流”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卓越的技术研究。“寒流”的吸引力在于,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具有客观方法的科学。这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无关。然而,当“寒流”支配的时间太久,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人们开始将它视为诸多方法中的一种,认为没有理由只认同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正是在使马克思主义回归到一种平衡的过程中,“暖流”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后的俄罗斯,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关于“暖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争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暖流”太多也有很多危险,它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并过于依赖含糊的承诺。过去它已经导致了无效的革命活动,就是在不恰当的时间从事这样的活动。一旦将其放任,这些激情就很难控制,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这



种倾向的存在,使太多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时都是年轻人。这场运动为工人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将他们从全国各地组织起来。但它承诺过多,当承诺不能兑现的时候,就可能导致深深的失望。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需要对经济和社会力量进行谨慎而冷静的分析。他们认为这对早期社会主义的“暖流”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平衡。

臧峰宇:您的这种看法很有启发性。我觉得苏联教科书有很多正确的基本原理,而如何用这些话解释一个个具体的事情而不至于抽象的教条,值得深思。我前一段时间去捷克参加了“科西克和具体的辩证法”国际研讨会,这使我进一步理解科西克哲学以及国际学界的新解读。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一度流行,他融合了海德格的存在论、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苏联教科书思维。当然,检讨苏联教科书的方面也很多,例如,他认为其中很多重要观点来自于狄慈根甚至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与马克思强调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的出入。而更关键的是,他认为苏联教科书思维缺乏具体感,如果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暖流”,是否同样需要考虑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应当如何建构这股“暖流”和日常生活的实际关联?我认为中国人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意在实际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似乎可以被用来解释您所强调的“暖流”。

罗兰·博尔:在2015年春季学期,我有很多机会与学生们讨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解。让我高兴的是,研究生课堂上有2/3的学生或者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青年组织的成员。当我问他们入党的理由时,他们作出了一些有趣的回答。起初,有些人说原因是当他们完成学业时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一两个不是党员的同学对此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们将这视为唯一的原因。但我在其他人身上发现了关于这个原因的积极维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还有其他入党的人

说,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我被告知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回答,因为家庭在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感到马克思主义正在成为中国人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但最有趣的回答令人感触至深。一些年轻人认为他们通过入党,会以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为中国的集体利益作贡献。这个回答打动了,尽管在今日的中国,个人满足感或自我利益的诉求不断增强,但这种更大的集体利益的意识仍然很强。

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年轻人不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根据,而且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激情领域以及令人兴奋的思路是十分重要的。这应当包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所做的贡献,以及将会作出的贡献。这还包括意识到一个人对科学研究、哲学家的著作或文学作品的偏好也会受到情感维度的影响。我们对某一学科或方法的情感依赖超越了理性的决定。对于我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游戏和欢乐的可能性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严肃的、冷静的和谨慎的研究,也应该有机会在马克思主义中通过马克思主义来享受生活。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口号,体现了这个意义:“聚会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如何享用生活和享受自我。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因为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更加乐观,因为马克思主义为生活提供了乐观和活力。

臧峰宇:我认为这也反映了文化认同和历史特质。中国大学生几乎都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历史细节也很感兴趣。当您讲授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的时候,您会感到他们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研究都不陌生。当然,您的很多微观解读会让他们感到新奇。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原因是,鲍威尔对自我意识哲学的阐释是建立在对《圣经》批判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神学与现实的世俗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应当将天国的批判变为尘世的批判。为此,他对大学时为他讲授《以赛亚书》的鲍威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鲍威尔,这位马克思曾经的老师和朋友,后来成为“自由人”小组的成员。当然,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和拜物教的



批判具有更实际的作用。在他看来,对货币、商品和资本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错觉。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拜物教的现实作用,而这个作用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

罗兰·博尔:在谈论拜物教之前,我想说的是,鲍威尔当时在很多方面都是德国主要的激进学者之一。基于他批判《圣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他发展了一种彻底的无神论,深入批判了宗教和普鲁士国家。他将宗教批判为虚假的普遍性,他声称普遍性来自于特殊而有限的处境,因而成为教条的、压迫的和反动的东西。为了实现自由和无限的自我意识,必须抛弃宗教,使国家成为无神论的国家。在当时的普鲁士,这是一个极为激进的立场,它使鲍威尔失去了在任何大学任教的机会。马克思的回应是,鲍威尔对真正的自由的探索迷失了方向,因为即使在一个世俗的无神论国家,宗教也能找到新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这个回答并没有侧重于宗教,而是侧重于人类生存的深层异化。

至于说拜物教,它是马克思以一种很新颖的方式重塑的核心的宗教观念。马克思对拜物教的研究长达40年,他第一次遇到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读到一位人类学家查尔斯·布罗塞的著作的时候。在人们交换的过程中,拜物教是被归属于不同权力的对象,在此过程中权力也被转让了,但它具有真实的力量。第一次对其进行描述和命名的是15世纪在非洲的葡萄牙探险家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它成为分析所谓“原始”宗教的关键范畴。马克思发现拜物教的哲学观念对分析劳动力、金钱、商品和资本主义本身都是非常有用的。

臧峰宇:这个观念后来被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逻辑,这时它的现实性比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几乎纯粹的哲学分析更为有力。商人在逐利过程中享受钱生钱的过程,对物的迷恋或者说对钱的迷恋几乎成为很多人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现实性使之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商品概念也被作为生钱的利器,在概念的炒作中,商品得到了增殖,当然也有些沦为破碎的泡沫。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并未消失,甚至更为棘手。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来临,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确实可以在马克思的拜物

教批判中获得丰富的思想资源。毫无疑问,文化信仰在当今时代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心,当拜物教占据人们的心灵,当人们不再崇尚高尚的事业时,社会将遭受严重的问题。

罗兰·博尔:是的。由于他对这个概念最著名的使用来自于《资本论》第1卷中“论商品拜物教”那一节,我想简单谈谈他在这里的用法。马克思寻找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个双重过程:拜物教使自身依附于商品,同时将工人的权力转移到他们手中的商品以及如同商品的现实中。换句话说,当商品彼此交换的时候,它们似乎获得了人类的属性,而工人变得越来越喜欢物,也就是物化。同时,权力或商品拜物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工人。如何谈论这个过程呢?马克思行走在语言的边缘。他认为商品拜物教既是虚幻的,也是真实的;既是不易察觉的,也是可以感知的;既是神秘的,也是具体的;既是为薄雾笼罩的,也是实际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一个关键的术语,“有社会效力的范畴也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思维形式可以成为客观的和有社会效力的。

为了形成这种见解,马克思使用了宗教范畴——拜物教。在《资本论》后面各卷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最初的见解。事实上,他开始认为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运转着,如果认为钱只会产生钱,没有商品生产这一关键的中间阶段,这种信仰最终会成为拜物教。那种认为我们能在钱本身中产生钱,或相信如今被称为市场的“金融化”的东西,就是彻头彻尾的拜物教。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创造了另一个术语——资本拜物教。这个观点迷人的方面是,马克思使用从宗教研究中产生的观念来表述资本内部非常神秘的运作过程。

臧峰宇:您刚才谈到马克思对希伯来圣经的批判,这大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总体思路,而这种批判最终体现的是辩证的批判和历史的批判。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详细解读,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生产方式、阶级差别和冲突等角度研究了宗教问题及其历史,其中生产方式被视为解读《圣经》的关键视角。这项研究是相当现实的,它将对宗教教义的研究转化为对尘世的批判。我认为马克思对宗教的解读主

要指向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解读中,“宗教鸦片论”和“宗教劣质酒论”非常著名。当然,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中,“鸦片”指的并不是毒品。这在青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可以看到,而恩格斯的“宗教意识形态论”具有深刻内涵。在恩格斯看来,宗教是一种思想体系。中国著名宗教学家方立天先生将宗教理解为一种文化。我认为这种理解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确实是一种必要的视角。

罗兰·博尔:我谈谈对宗教这个术语的评论吧。最近,关于历史上对这个术语使用的争论再次升温。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拉丁文“religio”,它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维度,即将人们与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联系起来的意义。最近,学界开始关注这个词的欧洲殖民意识。当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探索和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关于他们所谓的宗教的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是,他们通过这个术语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模式:一个宗教必须有一个上帝或诸神,必须有一个机构如教会,必须有宗教专业人士以及一种思想体系,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或神学。于是,他们开始将其他文化机体和思想实践命名为宗教,并赋予它们佛教、印度教、道教甚至儒教这样的名称。当然,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体系都符合这种定义,例如,儒教就没有诸神。显然,宗教是来自特定条件的抽象。然而,它是一个需要我们研究的抽象概念。

在很多方面,马克思预先使用了这种方法,虽然他作出了一种特定的唯物主义的解读。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产生于异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相对于这个有很多问题的世界,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构想。正是这个原因使马克思觉得攻击宗教是一种错误,因为它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社会问题的结果。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洞察力,马克思也没有对宗教的另一个维度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动态的理解。然而,我们确实在他的早期评论中发现了“人民的鸦片”这一看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他是无精神

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

他是在这段话结尾处提到鸦片的。马克思在这段话之前指出,宗教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宗教可能是一声叹息,是无情的和无精神活力的世界的心境和灵魂,但它也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的苦难挑战现实的苦难,它质疑苦难,质问我们为何要受苦。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抗议,马克思在这里使宗教具有一种微小的积极作用。宗教何以能够抗议呢?马克思意识到,宗教为我们当前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在天堂,也可能是未来。但以更好的选择取代我们当前生活的想象,同时也是对这种生活的批判。宗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种生活并不像应当的生活那样好,事实上,这种生活是一种痛苦。

臧峰宇:确实,马克思看到人们信仰宗教实则是对现存世界的否定,人们在宗教中可以缓解痛苦,但这并不能结束苦难,现实的苦难必须在现实中解决。在这里,他将宗教视为一种止痛剂,它并非全无作用,但这个作用是存在于想象中的,而解决问题要进行尘世的批判。这需要在历史语境中理解马克思“鸦片”一词的所指。对于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国来说,人们对鸦片的理解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列宁所说的劣质酒与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意思相似。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真解读恩格斯的观点。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否定宗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在早年与很多牧师朋友谈论宗教与现实问题。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写过几篇十分重要的宗教研究论文,他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尤为出色。

罗兰·博尔:鸦片这个词相当矛盾,包括正面和负面的联系。在19世纪的语境中,特别是对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来说,鸦片被看作是一种有益的、有用的、廉价的药品,它也被视为激发艺术家和作家想象力的源泉。另一方面,鸦片也被视为一种诅咒,在19世纪后更是如此。鸦片既受到赞美,也遭到谴责,它同时被视为廉价的药品和危险的诅咒。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自己也经常使用鸦片。他用鸦片来对付他的肝病、皮肤问题(痛)、牙疼、眼痛、耳痛、咳嗽等等。这些疾病是由于工作过多、睡眠不足、饮食不好、吸烟和无休止地喝咖啡导致的。显然,马克思个人使用



鸦片影响了他描述宗教时使用的比喻。鸦片有助于止痛,甚至可以协助他在疾病中康复,但最终对于他处理深层次的问题是没什么大用处的。对马克思来说,鸦片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比喻。这正是他为什么用鸦片来比喻宗教的原因。像鸦片一样,宗教是希望的源泉,是治愈疾病的一种方式,是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叹息;但它也是一个不正确的世界的产物,它本身甚至可能是一种伤害的来源。

恩格斯进一步研究宗教的这个矛盾。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宗教可以是革命的。他的家族信仰基督教改革宗(加尔文派)。恩格斯在年轻时非常虔诚,但他深入阅读了最新的哲学和《圣经》批判后,这些阅读挑战了他的信仰,所以他最终放弃了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亲密的却也虔诚的朋友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格雷培讨论。他们的讨论涉及《圣经》、神学和哲学。但在争论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可以说是痛苦地意识到,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曾经可能是虔诚的,但他也是批判的。他看到在他的家乡乌帕塔尔有很多人很虚伪。在他的眼中,他们非常保守,但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剥削别人。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星期日在教堂虔诚祷告,但在这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臧峰宇:这时候他发表的很多文章署笔名“奥斯瓦尔德”,而他将这告诉了格雷培兄弟,并希望他们为他保密。青年恩格斯文笔优美,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力透纸背,正如您所说,他对这些虚伪之人的揭露不遗余力,这个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思想转变。在晚年的时候,恩格斯更关注宗教的历史,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论述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他的很多分析具体而实际,例如,关于宗教与农民战争和社会主义传播史的关系研究很有见地,特别是他关于宗教何时消亡的论述耐人寻味,“当成事在人,谋事也在人的时候”,这表明应当按照历史规律来理解宗教的发展规律。

罗兰·博尔:我同意您的看法。正是通过这些经历,恩格斯开始关注基督教的矛盾。它可能是非常保守的,反对科学和哲学中的新发现,反对新的政治方向并主张维持现状。同时,它也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挑战同样的权力。这个观点是在他

过去的岁月中逐渐发展的。一方面,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宗教消极和反动的论述并不少见。他写道,宗教是神秘和欺骗的根源。有时对恩格斯来说,为共产主义斗争也是反对宗教的邪恶影响的斗争。同时,恩格斯又一再地认为,基督教具有革命的潜力。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基督教传统以及它们的领导者,例如,托马斯·闵采尔、艾蒂安·卡贝和威廉·魏特林。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并开始研究16世纪的德国农民革命。以托马斯·闵采尔为首的这场革命获得的直接启示是基督教神学,或者说《圣经》。

他最终的阐述是在1895年快逝世的时候,尽管他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40年。这时他具有挑战性地指出,基督教的起源是具有革命性的、宗教性的和政治性的。恩格斯的观点基于以下三点:(1)早期基督教的追随者是穷人和被剥削的人们,也就是农民、奴隶和无业的城市贫民;(2)早期基督教具有他所参加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很多特点,例如,教派、斗争、资金缺乏和假先知;(3)最终它被罗马帝国接管了。我们可以不同意恩格斯的某些观点,但我认为他完全提出了这些观点,这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公平地说,很多社会主义运动都与这个观点有关。有些与宗教革命家的关系很密切,例如在南美和非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臧峰宇:最近,您开始研究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就引入国际学界,从而丰富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因素。这项探索令人赞赏,这将有助于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走出语言等因素的障碍而进入国际学术的视野。您试图从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纵深这项研究,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解读,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乃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风格的关键之一。充分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内蕴的理论结构和实践逻辑,实际是揭示欧洲马克思主义和英语学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种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般而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在您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民族特色是什么?

罗兰·博尔:我的想法目前是非常初步的,因为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外国人,通过每年在中国3个月的生活,我正在渐渐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可能提供一个外国人的见解。当然通过进一步研究,也会消除一些需要克服的盲点。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哲学的不足之处。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主要是毛泽东的著作。这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义国际运动”^①的结果,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成功的结果。这种心态仍然是“十月革命”之前的心态,而他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由这个角度来决定的。相比之下,我注意到中国哲学工作者注重对“十月革命”之后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出现的问题、对付反革命的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以及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这意味着学术视角是全面的。为此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促进新的思维取向,并需要对新方案作出评价和考察。

最好的例子是研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和后来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段时间不感兴趣,认为它远离了毛主席的时代。结果是,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忽视了。而对外开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理解是,大多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与毛泽东执政时期具有复杂的连续性。我只是开始欣赏这种思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臧峰宇:我很赞赏您这种观点。国外学者对1978年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颇丰,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非常深入,但对1978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相当有限的。由于这种偏好,国外学者缺乏对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了解。这种情况与中国学者对西方世界发展非常充分的了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相融。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与大卫·麦克莱伦教授谈过。他曾说他为他的著作《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新版增加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内容,我对此很期待。您谈到的这个研究计划也很让我期待。我也感谢您邀请我担任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罗兰·博尔: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更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很缺乏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这个观察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人类学、文化以及最近关于宗教的探讨。鉴于这个原因,研究这项课题要确定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的国际会议,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并发表论文。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要适应新的环境,随着新一代的贡献而变化的。这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世界各地无所不在的影响;与外国的不断谈判以及中国在应对挑战中做出的贡献;对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表明,对那些经典的理解总是在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并在事实上融会贯通。我甚至大胆地认为,正如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复文化,试图找到“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新答案。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虽然我们还需要等待这个过程的结果。

臧峰宇:我同意您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体现为独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文化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研究受到同等重视,其中文本解读、原理重释和现实问题研究精彩纷呈。辩证唯物主义、

^①“毛主义国际运动”(Maoist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是美国一个信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的左翼组织。“毛主义国际运动”创建于1983年,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爆发了国际主义革命运动,一个名叫“激进学者”的组织是它的前身。在1984年,该组织更名为“毛主义国际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价值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同步展开,可为理论创新代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最近这些年持续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同时,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名著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得到翻译和介绍。然而,由于语言等方面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这种情况亟待改进。您在中国生活三年多了,我觉得您对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成果应该有些直观了解。

罗兰·博尔:在完成目前的两个项目后,我计划开始将我的全部注意力转向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已经在某些领域作了一些初步研究,至少可以对此说点什么。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感兴趣。显然,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辩和讨论,有很多文章和著作,甚至有些杂志出专辑作过一系列讨论。研究这些资料很快就可形成一些经常性议题:(1)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多样性的重要性,其核心原则在不同的社会得到应用和发展;(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创造性及其灵活运用;(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有新的观点、主张和思想;(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指经济和政治,而且指人的存在,包括哲学与文化等方面;(5)和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6)实事求是,其中“是”是唯物主义真理,而“实事”来自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实验和政治建设的实践。然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在没有像欧洲那种与宗教广泛互动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以及关于矛盾的讨论。

臧峰宇:正如您所说,现代中国文化内涵丰富。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其主导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此外也包括同其他区域文化的融合与新兴文化的产生。当然,马克思哲学来自于西方社会,它体现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形式。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些复杂。例如,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时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我们说的可能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哲学以及其他领域。这个表述有些模棱两可。我们曾谈到,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

中国优秀文化的复兴,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所有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当然,为马克思主义所提升的现代中国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儒家比其他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有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实际上也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

罗兰·博尔: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当然也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影响如此之大,确实可以用社会主义特征来谈论中国文化。但我要先谈谈对传统的反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不变的,它与古代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个事实,传统又是不断变化和自我重塑的。如果没有经历不断地重新解释并随着每个时代由每一代人来调整,传统就不成其为传统。当然,每一次重新解读的前提都是恢复传统的思想,这时它就通常被理解为是不变的。在传统中确实有一个辩证的关系!

对书写文本的文化解读要通过重读文本并发现新的解读角度来实现,而这与时代相关。我所受到的部分训练是在希伯来语、亚拉姆语、希腊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和拉丁语中解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古籍。当文本形成的时候,重新解读就已经开始了,更不用说3000年后或更久远了。所以,中国也有一个书写传统或者说圣经传统,其中各种经典为重新演绎和重新解读确立了基础。然而,口头文化在传统中的作用有些不同。每一代人在每个时代讴歌主要故事的时候,都会增加新的角度、新的观点甚至是新的故事。通常来说,这些文化更古老,它们后来都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被转化为书写资料。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用连续的传统可以将其追溯到五万年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也有文本传统或者说圣经传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文本都成了神圣的文本。相反,我的意思是,在不断重新解读的过程中,传统向很多不同的方面发展,在以这种方式重新解读文本时,人们试图获得新的见解。



的方式改变了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在大陆,文化路径有些不同,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最后,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已经过去的传统的关系应遵循关于旧和新的辩证法。在很多方面,革命的前提是与过去划清界限。过去的一切都必须被抛在一旁,必须实现新的开端。很多共产主义者都以这种方式面对过去。然而,很多共产主义者也认为,新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这需要辩证地对待过去和传统,将传统中好的方面转化到新的环境中来。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一些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运用这个对待传统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3页。

【责任编辑:李凡】